

新藏品里悟初心

纸墨传递信仰的温度

北大红楼

今年是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北大红楼的守护者,每当我驻足展厅,仰望李大钊先生手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总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思想激荡。这副对联不仅是先驱者探求救国道路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展览的精神主线。

近5年来,我们秉持“学术立馆、文保强馆”理念,深挖馆藏资源,让一份份珍贵史料呈现于观众眼前。循着这些珍贵藏品的精神脉络,我们愿与观众一同回溯觉醒年代的峥嵘过往,在历史的回响中感悟初心使命。

踏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展厅,第一件藏品是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载其中。彼时神州大地深陷内忧外患,各式改良思潮轮番登场,终究无力扭转民族沉沦的危局。李大钊不愿固守书斋,毅然扛起探求救国道路的重任。这篇2万多字的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与剩余价值理论,厘清阶级斗争学说是贯通三大理论的逻辑主线。他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篇文章如思想灯塔,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系统传播阶段。这件藏品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顺着历史足迹,第二件藏品是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杂志第二卷第二号,其中刊载李大钊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完整再现了建党筹备阶段组织建构的探索历程,这篇文章是他唯一专门阐释建党方略的篇目。从理论播火到擎画建党,早期共产党人知行合一、勇挑时代重担,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目光转向第三件藏品——一封跨洋寄来的珍贵信札。1920年8月13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首次完整勾勒建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家博物馆——

伟大建党精神的新时代物证

黄黎

这是一面国旗,因无数次海风撕扯而起起了毛边,它是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在开山岛上升起的最

后几面国旗之一。旁边的一本值班簿纸页泛黄,一只手电筒的金属外壳锈迹斑驳。相邻展柜里,张桂梅用过的喇叭外壳露出底漆,手抄党章的封皮已卷边,内页字迹工整如初。寻常不过的5件文物,拼出来的却是不寻常的两个字:信仰。

回首建党百余年,信仰的火种从未熄灭。革命年代的坚守,多是直面枪林弹雨的壮烈牺牲,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践初心;新时代的担当,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静默坚守,经年累月的无私奉献。一时的英勇靠血性,一生的坚守靠信仰。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在孤岛旗杆与大山讲台的日复一日。井冈山时期,红军战士把“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用一次次反“围剿”的胜利来回答;今天,王继才夫妇把“这岛值不值得守”的质疑,用32年间从未间断的升旗来回答。开山岛面积不足两个足球场大,无水无电,台风一年刮几十场。在王继才之前,开山岛哨所先后换过多批守岛人,最长的只坚持了13天。而王继才不仅自己留下,还动员妻子王仕花辞掉小学教师的工作上岛相伴。他说:“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着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在西南大山的深处,张桂梅在用另一种方式为信仰着色。每天清晨5点,她的声音就通过喇叭准时穿透校园的薄雾。为筹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了不让一个女孩因贫困辍学,她拖着病体四处奔走,被人驱赶过、被恶犬咬伤过,吃尽苦头却从未动摇。她把党章常置案前、反复誊抄,字字句句皆是对信仰的淬炼。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每一次守岛记录与每一声晨起催促中留下刻度。“今天早晨我们俩在门前升旗,查一查岛的周围和海面,岛上的仪器一切正常”,值班簿上的字迹谈不上工整,因海风潮湿而有些洇染,但这样的记录重复了整整32年。王仕花说:“他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但他从没亏欠过开山岛。”张桂梅的小喇叭也记录着相似的刻度:每天清晨叫学生起床,课间操催促跑步,深夜催熄灯:“姑娘们,快点儿! 时间不等人!”这句重复了10多年的话,喊回了田埂上即将辍学的女娃,也喊出了大山里2000多名女孩命运的转折。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手电筒忽明忽暗的光

考古中国

奏响早期丝路交流先声

胡松梅

汉文帝霸陵与薄太后南陵西北角殉葬坑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出土的40余种动物以本地野生动物为主,包括大熊猫、羚牛、金丝猴等秦岭特有种。多数动物遗存依靠形态学与古DNA检测得以准确鉴定,但有两具出土于薄太后南陵殉葬坑内的地犀鸟和靴脚陆龟骨架,因缺少比对标本、原生地分布不在我国境内无法准确鉴定。

经过骨骼形态比对、古DNA检测和锶同位素分析,二者最终被确认为现今生活在非洲南部的红脸地犀鸟和泰国南部等地的棕靴脚陆龟的骨架。这一结果纠正了此前的推测,为探究汉代早期跨洲际文明互动提供了珍贵实物依据。

经初步形态比对鉴定,出土的红脸地犀鸟骨架为非洲地犀鸟属。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古DNA晓明团队提取样本并完成线粒体基因组测序,确定其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至南部南非草原的红脸地犀鸟亲缘关系最近。靴脚陆龟骨架的背甲长度远超我国本土陆龟,可判定为东南亚靴脚陆龟。靴脚陆龟分黑靴、棕靴两个亚种,日本东京大学龟类专家依据腹甲胸盾不相连的典型特征,确定其为分布于泰国南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及印尼群岛的棕靴脚陆龟,是亚洲现存体形最大陆龟。

薄太后卒于汉景帝二年,彼时官方丝绸之路尚未开通。而这仅有的两具异域动物骨架足以证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官方渠道之外已存在活跃的跨区域、洲际物种交流、民间商贸与文化往来通道。域外珍禽异兽被长途转运至汉代皇家苑囿,死后作为殉葬品埋入南陵外藏坑,成为皇家“地下苑囿”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脸地犀鸟以地面活动为主,飞行能力极差,并非迁徙候鸟;棕靴脚陆龟行动十分迟缓。二者都不可能自行跋涉数千里迁徙至关中平原。从传播路径来看,棕靴脚陆龟大致经由中南半岛—西南夷—巴蜀进入关中,是后世西南丝绸之路的早期雏形;红脸地犀鸟的传播路途更为漫长复杂,大概率借助印度洋贸易网络,从非洲东海岸抵达南亚的印度,再经滇缅陆路或南海—交趾—岭南海陆联运路线北上中原。这说明文景时期,由商人、探险家与地方政权共同构建的洲际交流网络已然形成,该物种与同时出土的绿孔雀、白翅栖鸭等,共同构成西汉早期跨洲际动物图谱。

凭借红脸地犀鸟的分子学实证,本次考古研究成果把中外物种常态化交流记录提前至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至少在公元前155年薄太后下葬前,非洲与东南亚异域物种已抵达中原,一定程度改写了汉代对外关系史与物种交流史。研究证实,传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欧亚非大陆已通过海陆双通道开展跨区域、洲际的文明互动与物质交流。这些异域生灵奏响了早期丝绸之路的交流先声,为张骞出使西域积累了社会认知与物质基础,也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渊源提供了距今2000年的考古实证。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汉文帝元年,南越进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犀四十双,孔雀二双”。《汉书·西域传》载,南越国归附后,国王赵佗特将岭南所产白象作为贡品送入上林苑。这些文献清晰表明,经由南越国中转、以南海朝贡贸易为途径,南方及域外珍禽异兽已进入关中皇家苑囿。薄太后南陵出土的红脸地犀鸟、棕靴脚陆龟,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也表明汉代对外探索的广度远超文献所载,印证了当时的中外物质与文化交流。

2000多年前,红脸地犀鸟跨越亚非山海、棕靴脚陆龟穿越中南半岛雨林,依托民间贸易网络落户关中,见证了文景之治的开放气度与王朝繁荣。2000多年后,这两具沉睡的古老动物遗存,以科学实证诉说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也再次彰显中华文明自古就是在不断对外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开放型文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我家有文物

爱上福州七星桥

黄谦

迁居福建福州仓山区郭宅村后的一个清晨,我漫步在新家周边拔地而起的群楼之中,不经意间发现小区栅栏外有座古朴的石桥,眼前为之一亮。

这里别有天地。满目的榕树、香樟、苦楝、茅草、野花,流水潺潺,水里的几尾小青鱼清晰可见!迎面走来一位晨练的长者,我问道:“伯伯好!这小河通往哪儿呀?”他说:“这原先是护城河,河水从闽江引来,灌溉附近的农田,又流回闽江,最终注入大海”。随着他的指引,我看到桥头上的碑刻,居然是宋代建造的!小桥东西走向,是石构二墩三孔平梁桥。桥长33.5米,面宽3.6米,不等跨,已淤塞一孔,墩呈长方形,桥面每孔用4根石梁铺成,其中一根石梁上有“天圣十年”字样。石板被岁月的步履磨得黝黑透亮,愈显肃穆坚挺。这一座桥梁,见证了宋明市井的繁华与近代历史的沧桑。凝视她,我与桥仿佛有了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

真心感谢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的胸襟与情怀,让这泓穿越千年的碧波,依然荡漾在我们的眼前。这座桥于1992年11月被列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地曾盛产竹编。闽北的良竹运输至此,经由精湛的竹编手艺,成为郭宅的经济产业。郭宅竹编曾远近驰名,民间说:老福州嫁女儿,陪嫁品必有郭宅竹编。北宋年间,郭氏先人筹资,在白湖河上修建长桥,便利往来,名为七星桥。岁月流转,上世纪50年代鹰潭至厦门的铁路开建,所用扁担、畚箕、石筐基本都来自这里,周边数百名村民支援铁路建设。

我瞻仰过京郊的卢沟桥,拜访过河北的赵州桥,也一次次徜徉在故乡惠安的洛阳桥。如今,家门口的这座古桥让我心旌摇曳!

我喜欢挑战“疑难杂器”

续凯

一盏台灯、一方软垫、一支细笔,早上坐定,再起身已是中午——这是山西博物院陶瓷修复师的工作日常。

我今年48岁,在陶瓷修复领域深耕了27年。自幼研习国画,后转学西画,大学主攻工艺美术,入行纯属偶然。1999年,读大学的我在一家美术培训班上课。班上有位学生家长每次接孩子,总在教室门口多站一会儿。他便是我后来的师父、山西古陶瓷修复专家高桂林。高老师带我去工作室,看破碎的瓷片在他手中重归完整。从此,我一头扎入陶瓷修复的世界。

一开始,师父只把做色、补绘画面等工作交给我。瓷器是立体的,作画只能悬着手腕。起初还真不太适应,但凭借美术功底与沉稳心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便习惯了。师父见我上手迅速,便逐渐将粘接、打磨、补配等工序也交给我。一年后,我已能独立修复瓷器。上世纪90年代,太原从事陶瓷修复的人不多,在旁人眼中,这不过是“修破烂”的冷门行当,但我们乐在其中。毕业后,我进入原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工作。彼时,不少藏家拿

着各类破损器物排队前来修复,经手了大量瓷器,由此练就了修复基本功。2020年,我的原单位合并至山西博物院,提升修复技艺有了更大的平台。

一件陶瓷,怎样才算修得好?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在修复过程中尽可能保留文物的原始痕迹。在山西博物院“夏商踪迹”展厅中,有一件我修复过的商代三足陶鬲,仔细端详,上面仍保留着一些火烧痕迹。将这些使用痕迹体现出来,是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读懂这件文物。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中,我用同样的方法修复了一件粉彩花鸟纹冬瓜罐的盖子。盖子上留有一些油渍和污垢,判断为传世器物,我便将包浆保留了下来。最终,我摘得了陶瓷文物修复师项目一等奖。“可逆修复”也是我一贯的理念。文物有生命,要留给后人重新修补的机会。随着修复材料和技术的进步,或许后人会做得更好。

该会的都会了,送来的器物也没什么新意,如何克服倦怠?我喜欢挑战“疑难杂器”。哥窑开片的瓷纹细密、衔接困难,通过反复实验,引入美术中的喷绘手法,一条线一条线地

喷涂,使新老开片精准“咬合”……攻克一个技术难题,就能往前走一段。

山西是古代中国陶瓷生产的重要区域。我所在的陶瓷修复部门,一线技术人员仅6人,却要面对数以万计的待修复瓷器。2025年,山西省人社厅评审通过了由我领衔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将技能传授给更多人。

一个人,一辈子,最多修1万件。如果教出10个人,就能修10万件。对每一件瓷器,我们都要怀有敬畏之心。

(作者为“全国文物大工匠”、山西博物院文物修复师,本报记者付明丽采访整理)

上新了

勾勒长江下游生动的文明模式

闻白

凌家滩的变形彩陶壶、磨盘山的陶瓮、余杭瓶窑北村的玉冠状器……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间,孕育出依托水网环境、稻作经济、玉石手工业和区域交流形成的独特文明发展模式。202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项目,旨在通过系统的田野考古与多学科协同研究,全面展现该区域的文明化进程。6月25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成果展”,是对5年以来考古研究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

展览以时间为轴,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遗址群等14处关键遗址为点,通过419件(组)展品,串联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系统呈现长江下游地区“以水为脉,以稻为基,以玉为礼,以都邑为枢”,走向早期国家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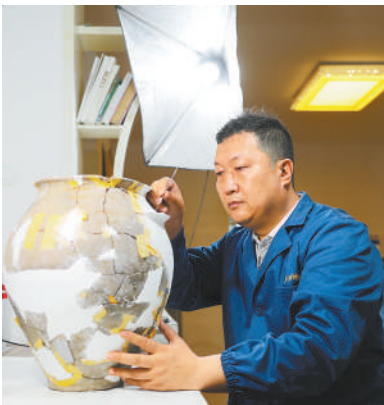
第一单元的几个遗址非常具有代表性。凌家滩遗址在近几年的考古中确认了多重环壕、复杂的公共空间以及高等级贵族墓地周围的祭祀遗存。

东山村遗址于2023—2025年进行新一轮考古发掘,揭示了一批崧泽文化大中型墓葬、红烧土祭祀广场等重要遗迹。磨盘山遗址与长江水系、环太湖水系连通,正处于东传西进、南来北往的重要地理节点,马家浜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较为丰富。3处遗址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长江下游区域文明形成时期的聚落规划、社会分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早期面貌。

第二单元“文明鼎盛阶段——良渚古城遗址群”,聚焦距今5300年到4500年的良渚古城。一件钟家港古河道出土的刻划纹陶盘残片(见左图)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个左手持钺右手举着网格状物品的小人是士兵、将军还是陶工匠本人?还有良渚北村106号墓出土的一件玉冠状器,宽扁倒梯形,以镂孔和阴线刻的方式作出兽面纹样,细看有双圈大眼和獠牙。这种圆形和弧边三角形镂孔与崧泽文化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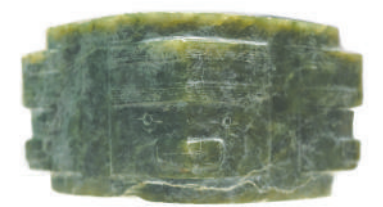
福州七星桥。

黄谦撰



续凯在修复文物。

郭苑甫摄



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兽面纹的元素也延续到良渚的“神徽”。

良渚复杂的水利系统也以沙盘的形式得到呈现。考古工作者在原有的11条水坝外,新发现20多处水坝及多条南北长垄、上坝、中坝和下坝三级库区体现了当时水利系统的完整性。而古城内部亦以河道水路划分不同的功能区,良渚文化晚期内城城墙和外郭的出现,更是显示了良渚当时已成为一个超级都市。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在距今5000年后进入多元发展的古国阶段,该阶段的

高等级区域中心遍布环太湖地区,其中寺墩遗址群、福泉山遗址群分别代表了太湖北西部与东部区域的发展面貌。寺墩的漆彩陶壶、福泉山的神人纹玉琮(见左图),都是文明发展的重要代表文物,而各区域中心之间的互动交流是认识良渚文明社会结构的重要线索。

第四单元“文明的经济基础——稻作与盐业”,则从施旸、茅山的大规模古稻田、大榭岛的早期海盐生产等考古遗迹,揭示了支撑这一区域文明的物质根基。长江下游密集的河湖水网,为原料获取、产品流通和区域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暗示着较为活跃的交换网络分配体系。农业、盐业、手工业之间的相互支撑,构成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形成,并非单一中心的孤立兴起,而是由农业生产、资源调配、手工业分工、礼仪制度和大型公共工程共同推进的文明进程,具有多路径并进、多区域互动的特质,这个展览很好地勾勒出这种复杂而生动的文明发展模式。

本文图片均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提供